

大与小 远与近
真与假 刚与柔
明与暗 强与弱
虚与实 进与退
直与曲 顺与逆

权谋学

伟大的政治家必是伟大的权谋家，
伟大的军事家必是伟大的权谋家，
伟大的外交家必是伟大的权谋家，
伟大的企业家必是伟大的权谋家。

权谋不是吸人骨髓的恶魔，
而是帮助人们走出困境、开启成功的钥匙。

刘国建 赵国华 著

大与小 远与近
真与假 刚与柔
明与暗 强与弱
虚与实 进与退
直与曲 顺与逆

权谋学

伟大的政治家必是伟大的权谋家，
伟大的军事家必是伟大的权谋家，
伟大的外交家必是伟大的权谋家，
伟大的企业家必是伟大的权谋家。
权谋不是吸人骨髓的恶魔，
而是帮助人们走出困境、开启成功的钥匙。

刘国建 赵国华 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谋学/刘国建,赵国华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 - 7 - 216 - 06801 - 7

I. 权…

II. ①刘…②赵…

III. 政治—谋略—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2347 号

权谋学

刘国建 赵国华 著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02 千字

插页:1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801 - 7

定价:29.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前言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人们会想到儒家文化,或者是儒释道三教,这当然没什么错。但依我们所见,仅凭对儒家文化或儒释道三教的诠释,就想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单就思想论思想,至多能弄清学派史、教派史,或者学派与学派、教派与教派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涵盖社会历史的整个画面。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本质上是人的思想和行为过程。对人的行为进行策划,制定具体的行为方法,并在行为过程中随机应变,是整个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包括儒释道三教的信徒,都不可能完全例外的事情。权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的权谋研究,大多停留在传统权谋典籍的注译评说,或者权谋故事的分类编纂上面,而少数研究者开始从整体上对权谋作理论探讨,也只是一种学术性的尝试。这里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把权谋研究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基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主题,人们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要想克服所面临的困难,或者赢得更大的成就,都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方

法。权谋正是人们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能力和方法。因此,把权谋作为一门学问,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多层次的开掘和整体性的构筑,有可能突破长期以来文化史研究的诸多片面倾向,有助于进一步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一、权谋的基本内涵

权,本来是指秤锤,因为衡量一件物品的重量,必须用秤锤系于秤杆,来回滑动,才能得到一个准确的重量,所以引申为权变、权宜,始有计谋的含义。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一些思想家经常把“权”和“经”视为一对范畴,用来说明人们的社会行为。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①这里所谓“道”是一般的行为准则,而“权”则是这一准则的灵活运用。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援之以手者,权也。”^②这里所谓“礼”是一般的行为准则,而“权”则是这一准则的灵活运用。孔子说的“道”和“权”,孟子说的“礼”和“权”,其实都是指“经”和“权”。《春秋公羊传》解释说:“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③这里把“经”视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而不符合这一准则却有良好效果的方法,则被称为“权”。简单地说,“经”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权”是随机应变的手段。

谋,《说文》解释说:“虑难曰谋。”意谓考虑事情的难处,找出应对的方法,就是“谋”。“谋”字初形从母。“所以从母者,人世一切谋虑,始于母之为赤子谋也。赤子初生,不能言语,赖母推心为之。时其饥寒而衣食之,候其疾痛而调卫之,以善以育,所以为之谋虑者,至周至密。”^④《尚书·洪范》说:“明作哲,聪作谋。”《诗经·小雅·皇皇者华》说:“载驰载驱,周爰作谋。”这都具有计

①《论语·子罕》。

②《孟子·离娄上》。

③《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

④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5,中州书画社,1984年。

谋、筹策的意思。如此说来,“谋”就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经过周密的思考而得出的行为方法。

权与谋,合起来讲,就是随机应变的计谋。荀子说:“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①刘向说:“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②正是就这种概念而言的。这说明权谋不是一般的谋略,而是谋略的一部分。它具有随机应变的特性。在人们习惯用词中间,有一些词语与权谋的意思相同或相近,一是权术,二是权数,三是权略。权术和权谋又是最常用的,只不过前者带有贬义,后者无所谓褒贬而已。至于人们常说的谋略,较权谋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它包含两层意思:谋为权宜之计,略为长远之策。权谋属于前一个层次。当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因为没有作这种层次的区分,就往往把权谋和谋略混为一谈。

人类在远古时代,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加上来自自然的侵害,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依据一定的血缘关系,结成淳朴的社会组织,谋取必要的物质资料,以维系最低的生活标准。在原始氏族组织内部,个体与群体或个体之间发生关系,就根本不需用什么权谋。即使不同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因为其目的较为单一,手段十分简陋,也很少带有权谋的性质。然而,与所有动物相比较,人类缺少锐利的爪牙,没有矫捷的肢体,只能靠丰富的知识、精妙的手段,应对社会各方面的挑战。所以,当人类告别野蛮后,无论是个体的关系,还是群体的关系,时而表现为和平的交往,时而表现为暴力的冲突;时而由盟友变作寇仇,时而由疏远转向亲近。在这繁纷复杂的关系网上,结出一个个权谋果实。

在整个传统时代,人们通常把权谋的出现,看作黄帝以后的事情。如司马迁修《史记》,正是以黄帝开篇,认为“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③,是黄帝的人生特征。后来,唐太宗和李靖讨论兵法,更加明确地

①《荀子·王霸》。

②《战国策叙录》。

③《史记·五帝本纪》。

指出：“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①约从黄帝以降，直到大禹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阶级社会替代氏族社会，“天下为私”替代“天下为公”，经过军事民主制阶段，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于是国家之间的冲突，部族之间的纠纷，政治权力的嬗替，经济贸易的兴废，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都成为滋生谋略的土壤。

大体说来，人类活动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科学实验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科学实验活动是人类提高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主要途径。这两种活动基本上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此不同的是，人类的社会活动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只要是一位头脑健全的人，不管是参与哪一种活动，都必然带有一定的目的。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每个人又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考虑：选择什么路线，采取什么手段。这样一来，社会活动以它有意志的特性，使得人们在进行某一活动之前，抑或在活动进行之中，都必须通过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的行为方法被程度不同地赋予权谋的特征，特别是传统政治的非程序化，剧烈而频繁的两军厮杀，以及国家、民族关系的复杂化，使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无处不跃动着权谋的灵魂，而权谋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和方法，存在于社会活动的每个角落。

乍看起来，权谋在各种社会领域的表现，总是那样千奇百怪，扑朔迷离，致使研究者感到无从下手。可是，如果稍作一点理论的剖析，就不难发现，历史上任何权谋的构成，都包括下列四种因素：权谋主体，即通常说的谋士、策士和智囊，指发明和运用权谋的一方，与权谋客体作为一对矛盾，在特定的权谋场内，总是要凭借特殊的行为方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权谋客体，主要指被权谋所指向或支配的一方，作为权谋主体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在一定的权谋场内，必然对权谋作出适当的回应。权谋场，指权谋所依托的各种客观条件，包括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什么情况，构成一种场合，对权谋双方

^①《李卫公问对》卷上。

具有同等意义,即决定着权谋的发明和运用,以及对权谋作出的回应,可以说是权谋得以确立的基础。权谋本体,指人们处于特定的权谋场内的应对能力和方法。这种能力和方法来源于每个人的思维,并且牵动着每个人的心灵。每个人的心灵都与众不同,好像一个未成熟的孩子:洒脱不羁,没有定式。因此,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权谋本体总是变幻莫测,即使把它从许多事物中抽象出来,仍会感到它无影无踪。不过,在人类的心灵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对应关系,能够体验到权谋本体的存在。除这种直观的“顿悟”,每个人还可以通过逻辑的分析和归纳,去认识和理解权谋本体,如果有相当的经验和理性,甚至能够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权谋诸因素中间,权谋主体、客体作为人的因素,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相互依存,没有权谋主体,也就没有权谋客体;反之亦然,没有权谋客体,也就没有权谋主体,双方在同一权谋场活动。他们相互排斥,权谋主体的存在,是为了战胜权谋客体;权谋客体的存在,也是为了挫败权谋主体,各自不同利益和目的,使双方陷于你争我夺,甚至你死我活的境地。不过,作为一对矛盾,权谋主体代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权谋客体则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权谋主体占据主动地位,对权谋客体具有支配作用;权谋客体处于被动地位,对权谋主体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和反作用,仅仅体现在权谋的实际运用上,并不决定权谋的最终结果。

每一个权谋的最终结果,决定于权谋诸因素的组合。就权谋主体来说,是否了解权谋客体的情况?能否正确地分析和利用权谋场?运用权谋是否得当?如何对待和处理权谋客体的反作用?可以说是他们战胜权谋客体的关键。就权谋客体来说,是否了解权谋主体的情况?能否正确地分析和利用权谋场?能否及时识破权谋?怎样对权谋主体作出有效的回应?可以说是他们挫败权谋主体的关键。权谋本体是权谋的内核,是权谋的规定性所在,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可以分解出许多权谋,权谋双方能否正确地把握和运用,或者及时采取有效的回应,直接决定着权谋的结果。就权谋场来说,一定的时间、地点,对权谋双方具有同等意义,但对权谋的运用和回应,却有着不同的影响,特别是权谋双

方的情况对比,往往不是倾斜于此方,就是有利于彼方,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无论是哪一方都难以取得成功。



二、权谋的理论特征

权谋作为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和方法,不仅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而且从整体上看很有一些共性。

有人喜欢把权谋说成是一种科学的,或者具有规律性的知识,并且经常同一些“原则”、“公式”联系起来。我们不以为然。科学有一定的规律性:在相同的条件下,同样的原因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这“相同的条件”既可以自然生成,也可以由人们设定。因此,科学的“原则”、“公式”,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权谋之于人类社会活动,却根本不具备这一特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会生活领域,这“相同的条件”永远不可能出现,每一个权谋场都是特殊的、不可重复的;另一方面,每一个人作为权谋主体,或者是权谋客体,也具有绝对的、独一无二的特性。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权谋场里,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并且采取不同的行动。所以,权谋最基本的特征,在于随机应变。这里的“机”是权谋主体面临的机会,是事情发生变化的枢纽,是影响权谋的重要环节。这里的“变”是权谋主体从做出决断,到采取相应手段的整个过程。“机”虽然属于一种客观存在,却总是极不稳定,甚至转瞬即逝,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是这个意思。“变”则属于一种主观反应,或者凭借着某种预测,或者根本没有既定的意向,几乎完全取决于权谋主体,也就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历代学者把权谋视为“奇”,视为“诡道”,正说明权谋本体并不具有规律性,相反是被偶然性所充斥。在各种权谋实践中,权谋绝对不能公式化,一旦走向公式化,就会丧失它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式化是权谋的死敌。因此,与其把权谋当作科学,毋宁把它视为艺术。

有人喜欢把权谋说成是一定的阶级意识的反映,并且总是同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我们也不以为然。在权谋诸因素之间,权谋主体、客体作为

人的因素,在传统社会里带有一定的阶级性,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如何对他们作出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研究权谋学所关心的,只在于权谋本体,权谋主体和客体在这里不过是权谋本体的某个方面的体现者。权谋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这目的既可以是浩浩族类的幸福,也可以是区区私欲的满足;这手段既可能充斥着腥风血雨,也可能被披上脉脉温情。因此,权谋既可以充当令人神往的天使,又可以扮演令人恐怖的恶魔。这些都是由权谋主体、客体所决定,与权谋本体没有多少关联。因为无论在何时何地,权谋本体都不受伦理的、政治的价值尺度的评判,必须接受这种评判的是权谋主体和客体。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人们运用一定的手段,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然而,某一种特殊的手段,并不单纯地适应某一种目的。人们既可以利用这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可以利用那种手段达到同一个目的。这部分人可以利用某种手段达到目的,那部分人也利用同一种手段达到目的。所以,权谋是不会被某一个阶级、政党或集团独占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权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又具有一定的超时代性。我们说权谋具有时代性,是因为一部分权谋仅仅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会日渐陈旧过时,以致于丧失生命力。我们说权谋具有超时代性,是因为一部分权谋一旦发明出来,不仅在某一历史阶段被人们广泛地运用,而且同样适用于另一些历史阶段。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过去发明的权谋,还被人们广泛地运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权谋本体的超时代性。

有人喜欢把权谋只看做是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惯用手段,并且经常同他们玩弄阴谋诡计联系起来。我们仍不以为然。权谋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且不应该是某个人或某部分人的专利品。历史上许多比较著名的权谋家,大都在统治者、最高统治者之列,但这并不意味着被统治者就同权谋无缘。恰恰相反,被统治者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中,曾经发明和运用过无数的权谋,只是被传统史学家们所忽视了。在中国传统时代,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怎么关注被统治者,没有注意反映被统治者的智慧,一部二十五史从来就不是为人民群众编撰的。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再无理地把被统治者排斥在权谋园

地之外,好像他们只晓得接受统治者的愚弄和压迫似的。进一步说,权谋本体属于一种内在的、隐蔽的软件结构,把它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总是要多少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因此,人们时常把一部分权谋当作阴谋诡计加以鞭挞和唾弃,在个人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认识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把权谋主体、客体和本体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把人们在社会活动中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方方法同运用这种能力和方法的动机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把各种社会活动所必须的手段同通过这些手段要达到的目的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至于那种“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观点,应加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怀着卑劣和邪恶的动机而运用权谋,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予以否定;为着高尚和正义的事业而运用权谋,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加以肯定。无论你怎么说,权谋作为一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方方法,是每一位头脑健全的人都能够享用的。

有人喜欢把权谋限定在某一个社会活动领域,画地为牢而不知变通。我们还不以为然。权谋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按照人们习惯的分类,它主要包括政治权谋、军事权谋、外交权谋、经济权谋等等。这样的分类,对于深入到各个社会活动领域去研究权谋,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职业性”委实不是权谋的属性,在每一类权谋之间也没有一条相互隔绝的鸿沟。政治权谋可以运用于军事领域,军事权谋可以运用于经济领域,经济权谋可以运用于外交领域,外交权谋可以运用于政治领域。各类权谋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即便是同一个权谋本体,作为权谋的内核,也可以得到灵活的发挥。它既可以被个人所理解和运用,又可以被群体所理解和运用;既可以运用于战略层面,又可以运用于战术层面;既可以运用于现实活动,又可以运用于未来计划。每一种权谋被运用到社会活动中去,都处于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过程。所有这些归结起来是由权谋的灵活性所决定的。

根据上述分析,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权谋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非科学性、超时代性、普遍性和灵活性。



三、传统权谋的流派

为了发明和运用权谋，人们面对权谋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早在先秦时期，对于权谋的理论思考，就有很高的认识水准。《周易》、《老子》、《孙子》等经典著作，不仅凭着深邃的智慧，开启了权谋研究的先河，而且阐明朴素的辩证法，为广泛地展开权谋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先秦诸子中间，相比较而言，兵家、法家、纵横家最为重视权谋。这三家因为各自所持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不同，对于权谋的理论探讨，也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大体说来，法家侧重于政治，兵家侧重于军事，纵横家侧重于外交。因此，对于权谋理论的研究，就形成三个主要流派：兵家权谋，以孙武为鼻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作；法家权谋，由韩非集大成，以《韩非子》为代表作；纵横家权谋，由苏秦、张仪所高扬，以《鬼谷子》为代表作^①。这三个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权谋理论的主要内容。

兵家权谋是中国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兵学包罗甚广，涉及兵法、兵略、兵制、兵器和兵家，甚至天文、地理和各类方术，而以兵法为核心内容，着重探讨战争指导问题。在中国兵学史上，与《孙子》相提并称的，还有《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北宋神宗在位期间，把这七部著作合刻行世，命名为《武经七书》。从此以后，犹如儒家有《五经》、《十三经》，道家有《道德经》、《南华经》，佛家有各种佛经，《武经七书》就被当作兵家经典，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军事权谋宝库。

《孙子兵法》被称作“兵法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即使用现代的眼光看，它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其中的军事原则。如先知原则：“明君贤将

^①有关先秦纵横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张子》等12种，《隋书·经籍志》仅有《鬼谷子》一种。依笔者之见，《鬼谷子》成书于战国后期，而不为六朝时期的作品。至于是什么人所作，一说是苏秦，一说是鬼谷先生，都缺乏翔实的论证，而前说似较可信。

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①；“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②。庙算原则：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比较战争双方的强弱，说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③，以预测战争的胜败。全胜原则：战争指导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④。胜战原则：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⑤。利动原则：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谋求利益，“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⑥。权变原则：“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⑦这一系列军事原则，不仅对于现代战争，而且对于各种社会活动，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国时期的法家，在地域上可以分为三派：齐法家、晋法家和秦法家。齐法家以慎到为代表，体现着道家向法家的转化，具有道法家的特征；晋法家以申不害、韩非为代表，强调权术的政治价值，具有法术家的特征；秦法家以商鞅为代表，主张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具有法家的典型性。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两派：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以商鞅为代表，后期法家以韩非为代表。他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国家为本位，致力于富国强兵；后者以君主为本位，着眼于专制统治。但就理论指向而言，他们阐发的权谋思想，大都局限于政治范围。

韩非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总结前期法家的理论成就，从强化君主专制的立场出发，坚持扬君抑臣的基本观点，构筑起一套“法”、“术”、“势”相结合

①《孙子·用间》。

②《孙子·谋攻》。

③《孙子·计》。

④《孙子·谋攻》。

⑤《孙子·形》。

⑥《孙子·火攻》。

⑦《孙子·计》。

的政治理论。其中所论之“术”，首先是“帝王之具”，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主要手段，即所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者也”^①。只不过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臣下玩弄君主的权术，也予以深刻的揭露。这驭臣之术和弄君之术合在一起，不仅是对先秦时期朝廷政治的归纳总结，而且对秦汉以后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不失为了一套承前启后的政治权谋。在《韩非子》一书里，韩非对政治权谋的论述，不仅有很多理论上的建树，而且通过列举大量的例证，使所持观点更有说服力。如君主考验和督察臣下的方法，主要有所谓“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②臣下玩弄君主、危害君权的手段，主要有所谓“六微”：“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③诸如此类权谋，虽然是为强化君主专制而阐发的，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又自然而然地成为官僚与官僚之间相互斗争，以及各级官僚统治人民的不二法宝。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外交舞台上最活跃的一批人物。所谓“纵横”，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纵”即“合纵”，是指山东六国从燕到楚，南北合为一片，共同抗击秦国，以保障各国的利益；“横”即“连横”，是指秦国与任何国家结盟，东西连成一线，攻击其他国家，以促进天下的统一。纵横家迎合战国中后期的政治形势，根据各国诸侯的需要，抱定“从横短长之说”，或者奔走游说，或者入朝干政，给各国诸侯出谋划策。作为一个谋士群体，他们在行为方法上，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崇尚策略，权谋至上。如果说法家信仰“以力服人”，儒家坚持“以礼服人”，那么，纵横家则主张“以理服人”。他们认为“安民之道，在于择交”^④，而能否正确运用权谋，是外交成败的关键。最高统治者运用外交权谋，可以发挥无比的效力，于内可使国治民安，于外可使“诸侯相亲”，于己则可得其

①《韩非子·定法》。

②《韩非子·内储说上》。

③《韩非子·内储说下》。

④《史记》卷69《苏秦列传》。

所欲。然而，总括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所谓“从横短长之说”，无外乎投其所好，巧言进谏；因人所惧，危言耸听；饰短颂长，弄虚作假；挑拨离间，纵横捭阖；倾轧反复，刚柔相济。在一个谋略场内，他们往往会提出三种谋略，“上不可则行其中，中不可则行其下”，藉此在诸侯面前显示权谋的力量。纵横家有文化、有智慧，通过演练和开展游说活动，给后人留下一大批外交文献，其中有的以国别分类，有的杂乱无章，直到西汉末期，经过刘向的甄选和整理，遂编纂成《战国策》一书，一直流传至今。这是一部较完整地反映战国时期纵横家为所事国家出谋划策的资料汇编。

与《战国策》不同，《鬼谷子》作为现今仅存的一部纵横家经典著作，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外交权谋的主要内容。如针对游说进策活动本身的特点和从事这项活动的方法等问题，提出了“量宜发言之术”。这里所谓“宜”，是指通过“量权”、“揣情”而得出的一种有利于己的游说进策时机。“量权”要从多方面进行，“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财货之有无，料人民之多少，辨地形之险易，别君臣之亲疏，观天时之祸福”^①。一句话，对权谋客体的考察要周详细致。至于“揣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②。每个人的性情因为不同的心境，而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只有当一个人的心境充分暴露出来后，权谋主体才能吃透其真实的性情。至于“发言之术”，包括许多内容，如说“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③，是因为与君主言奇，可以创立非常之功；与臣下言私，可以保全安身之道。说“无以人之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④，是因为这两种做法背离人之常情，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说“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进者言，依于

①《鬼谷子·揣篇》。

②《鬼谷子·揣篇》。

③《鬼谷子·谋篇》。

④《鬼谷子·谋篇》。

锐”^①，就几乎把游说进策活动的要领概括完了。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权谋学的发展，到秦汉时期已经大体定型。在西汉后期之际，刘向、刘歆主持文献整理活动，就比较关注权谋典籍。不独刘向编撰《说苑》、《新序》，列出“权谋”、“善谋”的篇目，来专门论述权谋问题，而且根据《七略》的著录，兵、法、纵横三家都有系列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兵家著作 53 种 790 篇，其中“兵权谋”有《孙子》、《吴起》、《范蠡》、《韩信》，共有 13 家 259 篇；法家包括《商君》、《申子》、《慎子》、《韩子》，共有 10 种 217 篇；纵横家包括《苏子》、《张子》、《庞煖》、《蒯子》，共有 12 种 107 篇。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对有关权谋理论文献的学术总结。



四、权谋认识的误区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价值取向、传播方式而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正统文化，一类是以权诈诡谲为特点的非正统文化。前者是理想主义的结晶，后者是功利主义的产物。前者为人们阐释社会理想、人生目标，以及达到这种目标、理想的途径，后者为人们提供统治方略、人生权谋，以及运用这些权谋、方略的条件。汉代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定型，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形成一种较稳固的统治思想。各派权谋理论尽管仍被广泛地运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不少新的发明，但是，作为一种非正统文化，因为它的价值取向不合乎“圣人之道”，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化大相径庭，所以在理论方面，不再被历代学者所重视，以致历经两千多年，人们对权谋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误区，如反权谋论、唯权谋论、泛权谋论等，而以反权谋论影响最大。

儒家在孔子那里，对于权谋的认识和理解，似乎还比较公允。但到孟子、荀子那里，就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自春秋以来，各国诸侯为了争夺民众，争夺土地，争夺霸主的地位，不惜连年发动战争，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给社会造成沉重

^①《鬼谷子·权篇》。

的灾难，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都是不义之战。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孟轲极为愤慨地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①这分明是一种情绪化的论调。殊不知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无论是保卫国家，抑或统一天下，如果离开能征善战者，都只是一句空话。而要赢得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必须结交同盟国家，削弱敌方势力，哪能离开纵横家呢？至于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经济收入，更是富国强兵的基础，任何统治者都会重视，怎么能加以惩罚呢？荀子尽管兼容儒法，但在本质上属于儒家，因而站在反权谋的立场上，明确地指出：“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②认为商汤、周武起自“百里之地”，而能成为天下共主，就因为昭义于天下；齐桓、晋文起自一方诸侯，而能成为天下霸主，就因为取信于天下；齐湣王起自万乘之国，而落得“身死国亡”，就因为“不由礼义而由权谋”^③。这就把权谋当作“信”“义”的对立面，给彻底地否定了。

道家在老子那里，包含着较多的权谋成分，如说：“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④这就是说想要收敛，必须暂且扩张；想要削弱，必须暂且加强；想要废弃，必须暂且兴旺；想要夺取，必须暂且给予，是谓深沉的预谋。这一权谋思想，反映出“以迂为直”的间接路线，同“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一样，都是《老子》政治思想的精髓。但是，《老子》具有明显的反权谋倾向。如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⑤这就是说抛弃圣智，民众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义，民众可以恢复孝慈的本性；抛弃巧利，盗贼就会自然消亡。这一反权谋的观点，同“智慧出大伪”、“不以智治国”一样，都是《老子》政

①《孟子·离娄上》。

②《荀子·王霸》。

③《荀子·王霸》。

④《老子》第36章。

⑤《老子》第19章。这三句话在简本《老子》作：“绝智弃变，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虽然文字有出入，但意思大致相同。